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国大陆 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评估

——基于1987—2018年新闻传播学SSCI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

吴 锋 王学敏

摘 要：选取1987—2018年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从“国际参与力”“国际影响力”“国际领导力”三个维度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新闻传播学SSCI论文生产的重要参与者，但尚无学术机构进入SSCI发文量前100名，且产自新闻传播院系的论文占比较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SSCI论文的被引频次、他引频次、H指数和ESI等指标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刊载论文期刊的影响力因子偏低，在国际顶尖期刊上的发文量极为有限。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国际领导力急需加强，全球SSCI收录期刊几乎被英美学术机构垄断，国际传播学会会士集中在少数美欧国家。因此，在“双一流”建设中，需要学者、机构、政府等协同努力，促进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关键词：双一流；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中国大陆；SSCI；国际竞争力

作者简介：吴锋，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新型智库“新媒体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王学敏，女，硕士生。（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 西安，710049）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9) 04-0043-10

一、问题的提出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大陆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国家科学与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2]一流学科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支撑。^[3]以国际化视野评估学科发展态势、准确把握我国在世界学科地图中的位阶分布，是促进高校学科建设的有力抓手。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强调“鼓励高等学校以国际同类一流学科为参照，开展学科国际评估”。2018年10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新闻传播专业。建设世界一流新闻传播学科，除了要积极参与国内学科评估，更应及时评估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地位，找到与世界一流大学及一流学科的差距，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一流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启示和对策。^[4]

一个学科的国际发表成果是彰显其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学者国际发表产出的快速增长，如何评估特定学科的国际发表竞争力，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

府在“双一流”建设上的财政投入规模不断扩张,高等院校的人才引进力度也不断增强。这些举措无疑会提升学科的国际能见度,推动一些学科的国际化水平。在新形势下,如何客观评估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竞争力?进言之,如何精准把握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位置?这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文献综述与评估框架

围绕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议题,学界开展了多视角的研究。张志安、贾鹤鹏的文献计量研究发现,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国际发表主要依靠香港和美籍华人引领,尚缺乏大规模的独立国际论文生产能力,在论文发表量和影响力方面与国际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差距。^[5]与此类似,韦路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论文总量已经跻身全球前十(含香港),但存在研究视角同质化严重、理论贡献有限等缺憾。^[6]此外,邓备对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者国际发表的起步时间较为接近,但香港国际论文产出数量较大,台湾国际论文的影响力较高,而大陆国际论文的增长更快。^[7]柯泽、李荣基对于中国大陆学界参与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年会情况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在该组织的注册会员数量、年会参与、年会主办、论文发表、高层管理等方面都非常薄弱,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非常乏力,急需克服重重障碍,提升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能力。^[8]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议题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全球化视野,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问题的研究首先要置于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宏观语境中进行体察,准确把握学科发展现状及趋势,而不是局限于中国大陆视角的本土化关照。二是缺乏理论构建,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的评估,需要多维度的理论审视,而不仅仅是单一维度的经验总结。三是缺乏指标体系,当前学界缺乏一套完整、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鉴于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及相应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进行度量。

“竞争力”本是经济与贸易领域的专业术语,最初聚焦于企业的竞争力,是指与竞争者相比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9]继而此概念拓展到国家竞争力层面,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产业经济或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10]近年来,其适用范围又扩展至学术领域,将特定学科的国际发表竞争力定义为,用科学的指标描述并评价一个国家或机构在国际发表中的产出表现及声誉概况。本研究认为,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是指我国学者参与国际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活动并产生学术影响,进而获得一定国际学术话语权及领导权的能力的总称。从目标看,国际发表竞争力指向国际学术话语权及领导权;从方法论上看,国际发表竞争力是一个可测量、可评估的概念,需要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本研究设定了“国际参与力”“国际影响力”“国际领导力”三个维度的指标,且三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11]

“国际参与力”是指在特定时间内一国参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相关学术活动的频次,它通常表现为一国在国际期刊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著、论文或评论的数量,^[12]是反映一国特定学科国家发表数量的基础性指标。为便于数据采集,本文仅考察一国在国际高水准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

“国际影响力”是指一国的学术产出对他国乃至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及被重视程度,是反映一国特定学科国际发表质量的核心指标。一国学术产出的国际影响力主要以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为衡量指

标。^[13]本研究采用 H 指数、ESI 论文数、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以及篇均他引频次等指标，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影响力进行量化评估。此外，本研究也将结合传播学 SSCI 发文期刊影响力因子以及期刊所属 JCR 分区分析中国大陆国际学术影响力。

“国际领导力”是一国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掌控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方向的引领能力，是反映特定学科国际学术话语权分布的衍生性指标。学术期刊是国际论文发表的主流平台，全球知名的优质学术期刊大多为欧美学术机构掌控，这些期刊的主办方或承办者以及相应的编委会、主编、学术编辑及审稿人等则是国际论文发表的“把关人”。因而，“国际领导力”首先表现为一国主办并被国际学术共同体认可（通常是被 SSCI 收录）的期刊数量。^[14]此外，会士（ICA Fellow）是国际传播学会主持遴选并授予的全球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每届 fellow 入选比例低于会员总数的 0.1%，因此该奖项在学界具有极高的认可度。他们通常是对全球传播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顶尖学者，其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代表了学科前沿的发展方向，在全球学术界有风向标或标杆旗帜意义。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RQ1：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参与力如何？

RQ2：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影响力如何？

RQ3：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领导力如何？

三、研究样本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SSCI 论文发表数量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也反映了特定学科在国际发表领域的竞争力。^[15]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收录了各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质量期刊，其中的“communication”领域包含了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传播等领域，相当于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科。本文选取 SSCI 核心数据库，检索主题“WC=communication”文献类型为 article，利用 Web of science 提供过滤、分析功能并结合人工排查，获得各国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发表数据。鉴于 1987 年中国大陆作者发表了首篇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故本研究将检索时限定为 1987—2018 年。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6 日，检索地点为西安交通大学，该校图书馆购买了 1900 年至今的 SSCI 数据库，覆盖全面。此外，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故而我们将中国大陆作者的 697 篇 SSCI 论文作为核心数据样本，并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参与力

参与学术知识生产是学者的天职，各国学者以融入全球学术发表体系为荣誉，但国际学术共同体是充满竞争的场域，论文发表前须接受国际同行匿名评审，未发表的论文难以获得传播和认可。参与国际学术发表有“门槛”，SSCI 收录期刊有严苛的筛选标准，门槛更高。1987 到 2018 年期间，全球新闻传播学领域共产出 SSCI 论文 53715 篇。发文量排名前 15 的主要是美欧国家，美国、英国、西班牙、荷兰、加拿大、德国等占据领先地位（图 1）。美国学者共发表 29612 篇，占总发文量的 55.13%，处于“超级大国”地位。英国共发表 4149 篇，占 7.72%，位居第二。澳大利亚进入全球前三强，共发文 2827 篇，占 5.26%。亚洲地区仅韩国、以色列和中国（含大陆和港澳台）三国入围全球前 15，其发文量分别为中国 1953 篇（为避免重复统计，此处剔除了大陆和港澳台跨区域合作的论文），韩国 1006 篇，以色列 922 篇。中国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表量位列全球第六，拔得亚洲地区的头筹。中国香港

产出 813 篇（其中 68 篇是在回归前所发），占全球发文总量的 1.51%；中国大陆 697 篇，占 1.30%；中国台湾 581 篇，占 1.08%。综合而言，欧美国家在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上有明显的数量优势，全球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呈现“西强东弱”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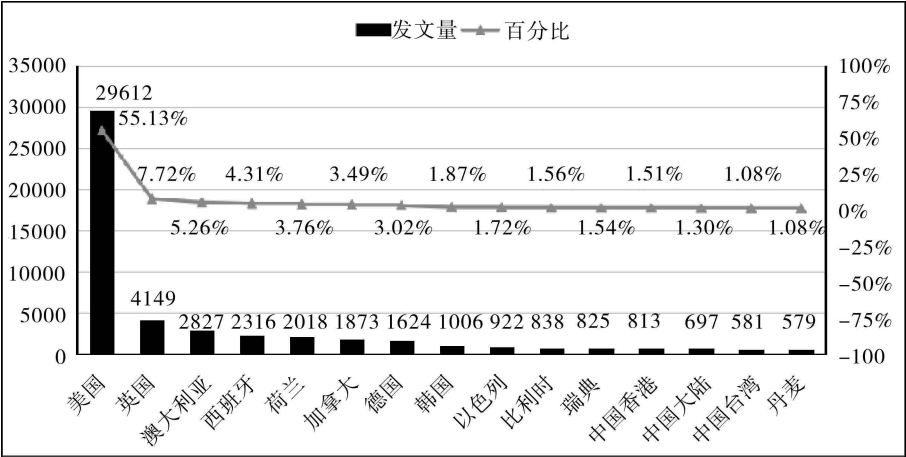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文量排名 (1987—2018)

哪些院校的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产出位居全球前列？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文量百强数据显示，1987—2018 年间美国有 69 家学术机构位居百强之列，发文量高达 24339 篇，平均每家机构发表 353 篇。加拿大有 1 家学术机构进入全球百强。荷兰有 3 家学术机构挤入全球百强，其平均发文量为 407 篇。英国有 4 家学术机构进入全球百强，其平均发文量为 170 篇。除此之外，欧洲的比利时、奥地利、瑞士、芬兰、挪威、西班牙均有学术机构进入全球百强。澳大利亚有 5 家学术机构位列全球百强，其发文总量为 1185 篇。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以色列分别有 3 家学术机构，新加坡有 2 家机构进入百强行列，其发文总量分别为 651 篇、609 篇和 490 篇（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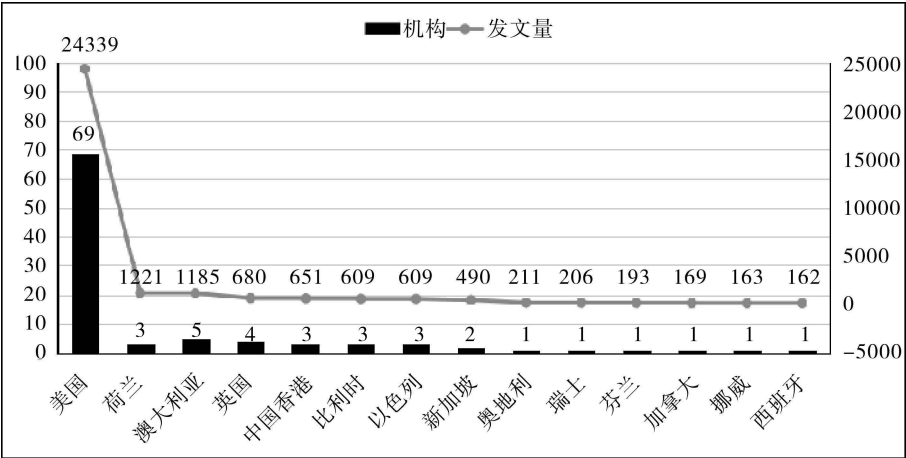


图 2 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全球百强高校院系分布 (1987—2018)

在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发文量前 10 的机构中，有 9 家系美国大学，荷兰有 1 家大学入围（表 1）。这些顶尖院校的发文量均高于 500 篇，其中，威斯康星大学位居全球之冠，发文总量为 1093 篇，密西根州立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分别发表 922 篇和 847 篇。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排名第四，发文量也达 789 篇。这些学校均为国际知名的世界顶尖大学。

总体而言，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发文顶尖机构聚集于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地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一些亚洲顶尖大学克服语言障碍，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已

经取得了明显进展；非洲和拉美的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产量偏低，处于边缘地位。目前中国大陆尚未有一家学术机构的发文量进入全球百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量最高者系复旦大学，仅有 61 篇，不仅与全球前 10 机构发文量有巨大的差距，而且与亚洲地区顶尖学术机构的发文量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参与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整体力量还较为薄弱，在发表数量上未形成规模优势，提升国际参与力任重道远。

表 1 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表量前 10 发文机构（1987—2018）

序号	机 构	地区	发文量
1	威斯康星大学	美国	1093
2	密西根州立大学	美国	922
3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美国	847
4	阿姆斯特丹大学	荷兰	789
5	俄亥俄州立大学	美国	731
6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美国	721
7	印第安纳大学	美国	686
8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美国	617
9	佐治亚大学	美国	610
10	宾夕法尼亚大学	美国	594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院系是否是 SSCI 论文的主要生产者？统计表明，新闻传播院系作者发表的论文仅占该领域 SSCI 发文总量的 26.22%，不足三成。49.64% 的论文产自非新闻传播院系，多为经济学、管理学、临床医学、外国语、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作者。另有 15.65% 的论文未标明院系归属。可见，新闻传播院系作者的产出尚未成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的主要生产者。当前，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院系的学术研究聚焦于新闻史、新闻理论、媒介经营管理等传统学科范围，缺乏学科交叉视野，在策略传播、健康传播、政治传播、气候传播、科技传播等西方传播学热点研究领域的论文产出明显偏少。

（二）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影响力

国际发表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同行传播学术观点，使得学术创新被国际学术界知晓、认可、引用乃至获得应用推广，产生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1987—2018 年，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产量排名前 15 的国家或地区中（图 3），美国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分别为 610430 次和 574535 次，篇均他引频次为 19.40 次，位列全球第一。英国、荷兰、加拿大位列第二梯队，英国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分别为 67713 次和 64567 次，篇均他引频次为 15.81 次；荷兰的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分别为 36539 次和 34208 次，篇均他引频次为 16.95 次；加拿大的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分别为 31716 次和 30997 次，篇均他引频次为 16.55 次。澳大利亚、德国处于第三梯队，其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均在 2 万次以上。西班牙、瑞典以及亚洲地区的韩国、以色列的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也达到 1 万次以上。总被引频次低于 1 万的国家 and 地区分别是比利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丹麦。就中国而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均在 8000 次以上，篇均他引频次分别为 10.93 次、14.32 次；中国大陆的被引总频次和他引总频次分别为 3462 次和 3239 次，篇均他引频次仅为 4.65 次。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数据是在手动剔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的基础上进行加总，数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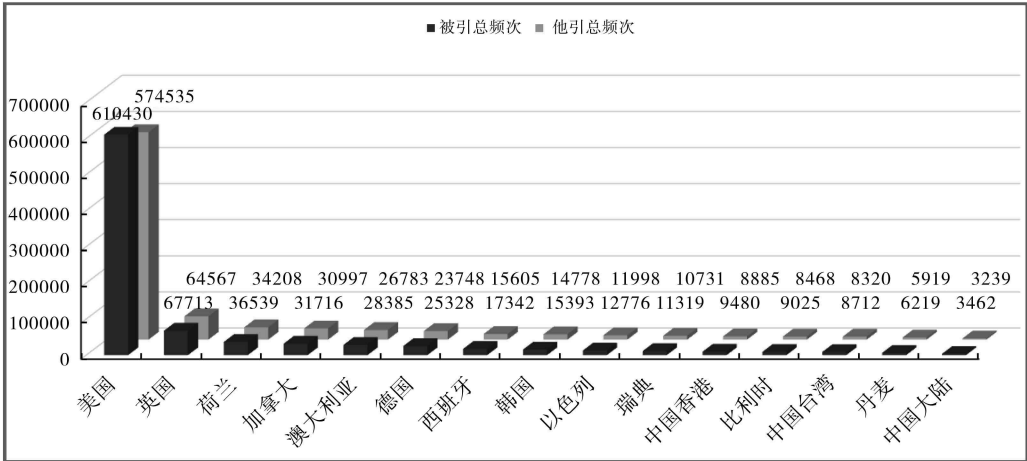


图3 全球传播学 SSCI 发文地区被引和他引总频次（1987—2018）

H 指数是衡量一国学科学术影响力的关键指标。在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表量前 15 的国家或地区中，美国的 H 指数为 222，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 H 指数为 101，排名第二。中国大陆 H 指数仅为 26，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 H 指数分别为 42 和 46。ESI 是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基于 SSCI 和 SCI 数据平台并按被引频次的高低排出居世界前 1% 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它根据同一年同一 ESI 学科统计最近 10 年发表论文中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 1% 的论文。在全球 249 篇新闻传播学 ESI 高被引论文中，美国产出 161 篇，英国产出 32 篇，二者合计占比高达 77.51%。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有三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其中两篇来自中国香港，一篇产自中国大陆，该文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发表的“Communing affiliation: Social tagging as a resource for aligning around values in social media”，文章主要论述了人们如何使用主题标签来感知传播社群的价值观。该文是 2015 年 11 月在西班牙巴比伦举行的第一届数字话语分析方法国际会议的会议论文，发表于 2018 年，这是中国大陆产出的第一篇 ESI 高被引论文（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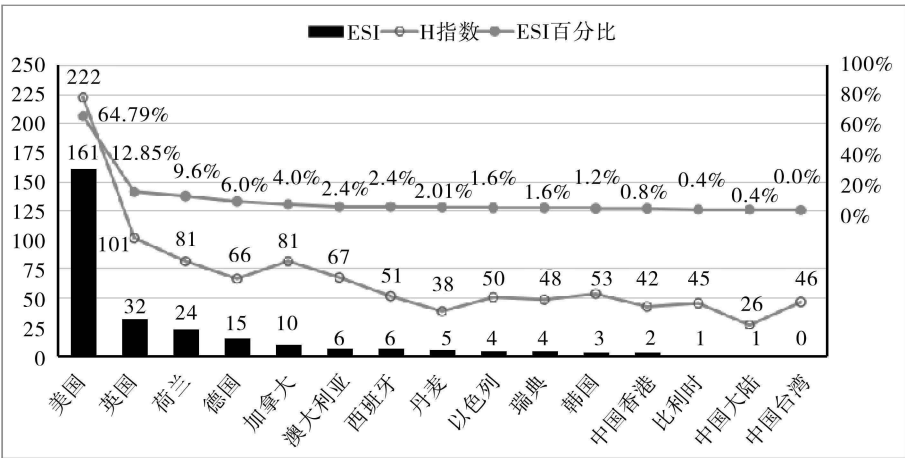


图4 全球新闻传播学 SSCI 发文地区 ESI 高被引论文数和 H 指数（1987—2018）

期刊影响因子和 JCR 分区可以衡量期刊被使用和受到重视的程度，代表该期刊所刊论文的学术影响力。^[16]表 2 列举了 1987—2018 年间刊发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影响力因子排名前 5 的期刊以及美国、英国和中国相应的发文量。影响因子最高的是《计算机媒介通讯》（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该刊在 1987 到 2018 年间的发文量达 546 篇，其中，美国发文量为 343 篇，占总量的 62.82%；英国 47 篇，占 8.61%；中国大陆仅产出 8 篇，占 1.47%。整体来看，美英等发达国家在这五种高影响力期刊上的发文量遥遥领先，美国高影响力期刊发文量占比达 63.212%，在顶尖论文产出方面呈“一家独大”格局。中国香港在五大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发文总量为 79 篇，中国大陆 36 篇，中

国台湾 33 篇，与美英国家有巨大差距。显然，中国大陆在高端论文的产出方面非常薄弱，扮演着补充者的角色。^[17]

表 2 1987—2018 年全球新闻传播学高影响因子期刊发文量分布

期刊名称	出版周期	影响力因子 (2017)	发文总量	美国	英国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发文量 (%)	发文量 (%)	发文量 (%)	发文量 (%)	发文量 (%)
1 JCMC	双月刊	4.0	546	343(62.82)	47(8.61)	8(1.47)	4(0.73)	10(1.83)
2 JOC	双月刊	3.729	1257	987(78.52)	49(3.90)	6(0.48)	3(0.24)	17(1.35)
3 NMS	11 期/年	3.121	1262	586(46.43)	157(12.44)	8(0.63)	14(1.11)	29(2.30)
4 CR	8 期/年	3.391	1042	871(83.59)	8(0.77)	8(0.77)	9(0.86)	16(1.54)
5 ICS	季刊	3.084	764	292(38.22)	141(18.46)	6(0.79)	3(0.40)	7(0.92)
合计			4871	3079(63.21)	402(8.25)	36(0.74)	33(0.68)	79(1.62)

注：JCMC=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OC=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MS=New Media & Society；CR=Communication Research；IC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主要刊载在哪些期刊上？检索发现，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主要刊载在二区、三区或四区期刊上，发表在顶尖期刊（一区）上的论文十分稀缺。表 3 列举了 1987—2018 年刊载中国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较多的前十家期刊。其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是位于 Q1 区的《电信政策》（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该刊主要关注移动通信技术及移动商务应用的理论和实践，刊载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论文量占同期中国大陆发文总量的 6.74%，排名第三。发文量最多的 SSCI 期刊是处于 Q2 分区的《移动通讯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其影响力因子为 1.742，发文量达 68 篇。学术界对 SSCI 数据库分类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移动通讯杂志》《电信政策》并不属于传播学领域的刊物，^[18]所以刊载在这两种期刊的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发文值得商榷。《中华传播研究》（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是亚洲地区仅有的两本 SSCI 期刊，也是中国大陆学者寻求传播学国际发表的主要途径，共发表中国大陆传播学论文 103 篇，占同期中国大陆发文总量的 14.78%。但这两种期刊的影响范围局限于亚太地区，影响因子偏低。

表 3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排名前十期刊分布（1987—2018）

序号	期刊名	创刊年份	核心领域	影响力因子 (2017)	篇数 (%/697)	分区
1	IJMC	2003	移动通信的影响	1.742	68 (9.76%)	Q2
2	CJC	2008	华人传媒研究	1.188	60 (8.61%)	Q3
3	TP	1976	信息技术的影响	2.087	47 (6.74%)	Q1
4	AJC	1990	亚太地区的传播	0.574	43 (6.17%)	Q4
5	IJCM	1990	争端谈判和解决	1.000	45 (6.46%)	Q3
6	IJC	2007	传播学和学科交叉	1.128	30 (4.30%)	Q3
7	PRR	1975	公共关系	1.374	19 (2.73%)	Q2
8	T&T	1981	话语和传播研究	0.426	26 (3.73%)	Q4
9	HC	1975	健康信息传播	1.710	16 (2.30%)	Q2
10	D&C	2007	话语和传播研究	0.789	14 (2.01%)	Q3

注：IJM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CJC=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TP=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AJC=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IJC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Management；IJC=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PPR=Public Relations Review；T&T=Text & Talk；HC=Health Communication；D&C=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领导力

期刊的主办者或执行者主导学术议程设置，引导学术发展趋向，掌管一定的学术话语权。一个国家主办或承办的 SSCI 收录期刊数量是其学术领导力的重要表征。截至 2018 年底，SSCI 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共 84 种，其中，美英两国分别主办 42 种、32 种，两者合计占总数的 88%。荷兰和德国分别有 4 种和 3 种，西班牙 1 种。亚洲仅有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各主办 1 种。目前，中国大陆尚无被 SSCI 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在国际化期刊建设方面还处于摸索阶段。

国际传播学会成立 60 多年来，共诞生会士（ICA Fellow）163 人，除去已故，对现有 140 位会士的统计发现（图 5），美国共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 105 人，占总数的 75%。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共有 17 人；亚洲的以色列、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日本均有学者入选，其中以以色列有 3 名，日本 1 名，其余三地各 2 名。中国香港的 2 名会士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陈韬文和香港城市大学的祝建华。由此可见，国际传播学会会士集中在少数欧美国家和地区，美国新闻传播学界的领军人才最为集中，欧洲国家次之，亚洲国家处于相对边缘地位。中国大陆尚无一名学者入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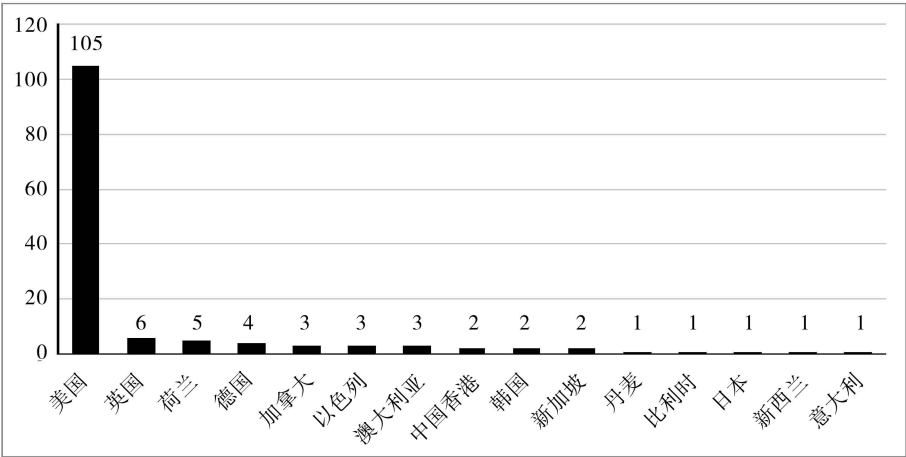


图 5 国际传播学会会士地区分布

五、结论与反思

“双一流”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大陆高校的重要使命。本研究从三个维度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基于 SSCI 收录论文的计量研究表明，全球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呈圈层式分布：美国处于核心层，在国际参与力、国际影响力和国际领导力诸方面均处于遥遥领先的霸主地位，扮演着核心领导者角色。西欧处于第二圈层，以英国、荷兰、德国为代表，在优质期刊、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等领域表现突出，在国际参与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占据优势地位。澳洲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地区的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均处于第三圈层，他们是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积极参与者，但学术影响力和学术领导较为薄弱，扮演追赶者的角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处于边缘化地位。

就中国大陆而言，虽然在国际参与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存在国际影响力偏低、国际领导力缺位等问题。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发文量排名全球第 13，但中国大陆尚无一家学术机构的 SSCI 论文产量进入全球百强，且新闻传播院系尚未成为 SSCI 论文的主要生产者。从国际影响力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的 H 指数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篇均他引频次也仅为美英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发文期刊影响因子偏低，刊发期刊多为 Q3 或 Q4。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传播学权威期刊上的发文量极为有限，

且低于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发文量。从国际领导力来看,中国大陆既无主办 SSCI 收录期刊又无人入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中国大陆在 ESI 高被引论文数、SSCI 论文产出百强学术机构、主办 SSCI 收录新闻传播期刊、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等关键指标上尚未实现零的突破。综合而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但是国际影响力有限,国际领导力亟待加强。

从历史演进看,我们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未来趋势持乐观态度。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产出已有 30 余年的历史,其演进轨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零星产出期(1987—1996)。1987 年复旦大学陆道政以第一作者在新闻传播学 SSCI 期刊《广告研究》(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发表了《受众计量学:一个初步研究》(Passive People Meters - A First Step),探讨了广告受众计量的具体路径,开启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进程。不过,缘于国际化研究力量薄弱,此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产出时断时续,10 年间共产出论文 8 篇,年均产量仅为 0.8 篇,其中 1989 年到 1993 年以及 1996 年,SSCI 论文产量均为 0。二是连续产出期(1997—2006)。1997 年底随着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确立,大量专职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19]为推动传播学国际化进程提供了人才支持,到 2006 年的 10 年间,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发表呈连续产出的态势,年均产量为 2.7 篇。三是快速增长期(2007 年至今)。自 2007 年起海归学者成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力量,SSCI 论文年产量超过 10 篇并呈快速递增之势,11 年间产出论文总量 662 篇,年均产出 60.18 篇,其中 2016 年年产量达到 95 篇,2018 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 SSCI 论文产量首次突破 100 篇,达 141 篇。与此同时,基于 CNKI 数据库的检索表明,1987—2018 年间,国内共产出新闻传播学论文约 139.2 万篇,其中 CSSCI 核心论文约 13.8 万篇;2018 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产出论文约 8 万余篇,其中 CSSCI 论文 7989 余篇。与庞大的国内发表相比,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才刚起步。中国大陆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大陆寻求国际发表者包括庞大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以及硕博生等群体,这必将推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快速增长,进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为促进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竞争力的提升,必须推出一些针对性举措。

一是在认知层面排除干扰。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学科,要不要认可国际发表的价值,学界还存在较大分歧。有论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必须服务于中国新闻传播改革与发展大局,要鼓励将优秀学术成果发表在国内期刊上,无须盲目推崇国际发表。^[20]但积极推进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是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抢夺国际话语权的客观要求,更是体现中国文化自信、走向国际学术舞台中心的重要途径,还是扩大国际学术影响力、讲好中国学术故事的主要手段。^[21]要通过政策引导、学术会议等途径,形成支持和推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共识。

二是在学者层面树立国际发表意识,提升国际论文发表水平。学习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紧跟国际发展趋势是国际发表的重要途径。研究的理论性和启发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是构成中国传播学者研究成果国际发表的必要条件。^[22]研究选题直接决定研究论文的质量,了解国际传播学主流议题和前沿领域,把握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从而为研究选题提供方向指引。

最后,在制度层面完善国际发表的奖励机制。机构奖励机制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学国际化研究有重要的影响。^[23]各高校学术机构除了积极组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项目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国际发表激励机制,使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成为学者的常态化需求。国家科研资助基金是一国科学研究发展的财政调控措施,尽快设立“新闻传播学国际合作基金”,扶持国际合作课题研究,提升中国大陆国际发表的能见度。此外,大力支持创办传播学国际期刊,引进一批国际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为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提供智慧支撑。

参考文献:

- [1] 宋永忠. 大学转型与发展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2: 6.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A1).
- [3] 韩洪生. 大学“双一流”建设途径探讨 [J]. 江苏高教, 2017 (8).
- [4] 杨倩, 王茹, 刘宇, 崔丹. 国内外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5 (39).
- [5] 张志安, 贾鹤鹏.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发表现状与格局——基于 SSCI 数据库的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5).
- [6] 韦路. 中国传播学研究国际发表的现状与反思 [J]. 国际新闻界, 2018 (2).
- [7] 邓备.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现状——基于 SSCI 传播学期刊的实证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8 (9).
- [8] 柯泽, 李荣. 中国传播学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观察——国际传播学学会 (ICA) 视角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2).
- [9] Aldington Report (1985).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on Overseas Trade*. London: HMSO.
- [10] Tyson, L D' A (1992).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Washington D C: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11] 吴锋. 全球传播学领域国际发表产出竞争力嬗变轨迹及最新态势 (1996—2014) ——兼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国际竞争力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9 (2).
- [12] Uzuner, S. (2008). Multilingual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 core/global academic communities: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7 (4): 250-263.
- [13] Feist, G. J. (1997). Quantity, quality, and depth of research as influences on scientific eminence: Is quantity most important?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0 (4): 325-335.
- [14] Hodgson, G. M., & Rothman, H. (1999).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economics journals: A case of institutional oligopoly? *The economic journal*, 453 (109): 165-186.
- [15] 刘莉, 刘念才. 1978—2007 年我国大陆与我国台湾、韩国、日本高校 SSCI 论文的比较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 (12).
- [16] 丁筠等. 提高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策略分析 [J]. 情报科学, 2012 (9).
- [17] Chesterman, C., Ross-Smith, A., & Peters, M. (2003). Changing the landscape? Women in academic leadership in Australia. *McGill Journal of Education*, 38 (3), 421-436.
- [18] Leydesdorff, L., & Probst, C. (2009). The delinea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pecialty in terms of a journal set: The cas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60 (8), 1709-1718.
- [19] 胡翼青, 张婧妍. 中国传播学 40 年: 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 [J]. 国际新闻界, 2018 (1).
- [20] 吴锋, 王学敏. 提升与超越: 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创新进路——首届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专题论坛会议综述 [J]. 西部学刊, 2018 (9).
- [21] 李明德. 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思考 [J]. 西部学刊, 2018 (1).
- [22] 金兼斌. 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 路径、困境和前景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 (4).
- [23] 祝建华. 传播研究国际化的国际经验: 个人学术训练与机构奖惩体制的影响 [A]. 中国传播学: 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 [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57-170.

[责任编辑: 赵晓兰]